

留日学生与贵州近代新式学堂研究

吴中旭

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 中国·贵州 贵阳 550000

【摘要】晚清时期中国掀起出国留学的热潮,尤其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留日潮高涨,虽然时间上留学日本比留学欧美要晚,但是在人数上多于留学欧美人数的总和,近代贵州留日学生,在推动贵州教育近代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留日学生作为外来文化的传播者,给贵州带来了新思想,积极投身于贵州新式学堂的创建,并且促进贵州学制、教学理念向近代转型,在牵引贵州教育近代化的动力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

【关键词】留日学生; 新式学堂; 教育近代化

Studies Studying in Japan and Guizhou Modern New School Studies

Wu Zhongxu

School of History and National Culture of Guizhou University, China Guizhou Guiyang 550000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China set off a wave of studying abroad. Especially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Reform Movement, Japan's tide rose high. Although studying in Japan was later than studying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t was more than the sum of the number of people studying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tudents staying in Jap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Guizhou education. As a communicationman of foreign culture, students in Japan have brought new ideas to Guizhou,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creation of Guizhou New School, and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Guizhou academic systems and teaching concepts to modern times. It is important in the power system that draws Guizhou's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effect.

[Keywords] Students in Japan; New School;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近代化指一地区民智之启发、经济之发展、政治之文明。贵州作为中国后进的省份,历史上是偏远闭塞的多民族高原省份。贵州近代教育起步艰难。通过梳理清末贵州留日学生在贵州近代新式学堂中的活动,对于深入理解微观贵州的近代化进程有着重要意义,留日学生处在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机缘,在贵州新式学堂的建设中发挥了独特作用^[1]。

1 贵州近代教育起步艰难的原因

1.1 历史文化因素

明末清初,由于久经战乱,政局动荡,当时的贵州学校受到破坏。直到吴三桂叛乱平定,社会渐趋安定,学校教育开始复苏。尤其是在“改土归流”以后,总督和巡抚力主“新开苗疆”发展教育,并发展教育作为“重要任务”。贵州学校教育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教育的普及,提高了贵州整体的文化水平,名师硕儒,蔚然而起。尽管明清时期贵州的文化水平相比前代有所提高,但是与全国省域甚至周边的云南、广西相比,人才依旧稀少。这里的“人才”,主要指明清时期中国一流的专家和学者。人才的区域生长和喷涌,除了社会生产力还存在一种人才相互影响的效应,人才的生长需要强劲的环境驱动,需要榜样的感染、激励和提携^[2],也需要文化和精神的交流互动。像江南那种经济基础雄厚的地区,人文渊数,贵州区位优势较差,虽然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进士举人,但是能成为贵州地方的文化引领者、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不多。

1.2 经济因素

贵州近代经济基础薄弱,山路极多,水系复杂,运输书籍的代价高,教育资料不易获取。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还受师资制约,缺乏名师教学,教育经费入不敷出,这种情况贵州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法帝国主义国家凭借不平等条约,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加紧了对西南的侵略,取得了在贵州“传教”和掠夺土地的特权,外国资本侵占贵州,加重贵州经济的负担。同一时期贵州军阀混战,主政贵州的军阀不断更换,滇川黔军阀在贵州相互征战,军阀集团各自发行货币,大量地方性货币流通,使

贵州的货币发行和流通极不稳定,这也导致市场混乱,经济发展缺乏内在动力。

2 留学日本的原因

赴日留学费用相对于欧美国家低廉,路进省费,达官贵人多选择留学欧美,胡适曾经留学康奈尔大学,欧美国家有很多世界一流的高校,这些高校的教育系统更加完善,日本与中国隔海峡相望,海上交通便利,海运成本较低廉,这也成为近代中国学子留学日本的主要原因。日本有留学速成班,1903年日本弘文学院规定,“肄业之年限,凡普通科者定为三年”,“此外,又有速成师范科、速成理化科等”,其他则有“本学堂为急欲完成学业者设特别科,肄业限为一年以内”。一年就能完成学业,许多中流人才去日本留学,贵州安健,先世为水西土司,本人乃清末附生,1905年东渡日本,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一些急于求学历,缺乏时间学习的军阀子弟、地方士绅选择近代日本的留学速成班,近代日本的速成班适逢这类人的需求。欧美的留学任务需要两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毕业要求高于日本的高校,中国近代急于求得学位的普通知识分子对日本的这类高校情有独钟。

3 贵州近代教育的起步

贵州教育的近代化和留学生的涌现离不开“西学入黔”的社会背景,19世纪,鸦片战争爆发,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发生巨变。魏源、冯桂芬等思想家发出了“自强攘夷”的呼喊;虽然贵州此时有少数人感受到时代的呼声,但整体依旧笼罩在传统的酣梦里,此后几十年,西学知识渗入贵州,适时贵州近代出版业尚未起步,贵州士子的西学信息需要外界输入,而这种传输渠道一直受阻。激活贵州的代表人物有李端棻,他是京师大学堂的倡议者,戊戌变法失败后被充军新疆,于1901年赦回原籍,他在贵州宣传新学,传播新思想,启蒙贵州学子,为贵州思想文化注入新活力,在贵州推广新式教育,建立了贵州第一所新市师范学校——公立师范学堂(贵阳师范学校前身),作为推广近代教育的基地,为推动新式教育的建立,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起了很大作用。

贵州1901年已派遣留日学生,1905年开始大量派遣留学生赴

日学习,全年累计资助官费、自费留学生151名,所学内容涉及教育、医学、法律各个方面,留日学生人数逐年增加。一直到1919年日本政府为了纪念日本和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大举庆祝,激起留日学生的愤慨之情,留日学生纷纷回国,回国后主要选择从政或执教,从事交通、教育等多个领域,从不同领域为贵州近代化做着努力。

3.1 新式师范学堂

师范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大部分从事教育事业。据统计,在全国23个行政省的1171名教员中,留日学生有370人;在各省师范学堂的467名教员中,留日学生有144人,贵州的留日学生学成归国后大多投身于这项事业。

乐嘉藻贵州镇远人,1895年赴京会试,曾参与公车上书题名,而后,自费赴日本考察学务,购置图书、标本、仪器等教学设备,记载他“经营商业,颇有财产”,1902年与士绅于德楷、李端棻等人在贵阳次南门创办公立师范学堂,为近代贵州最早的师范院校,这是贵州近代师范教育的开端,之后聘请贵州武备学堂数人兼任教员,于德楷担任校总理,乐嘉藻担任校协理,学堂的经费除少数学费之外,其他费用由乐嘉藻承担。当学生无力负担学费时,乐嘉藻会资助,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完成学业。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取胜,因此从俄军手中夺取中国辽阳,学堂日本教员邀请贵阳公立师范学堂在校生一起庆祝,这一伤害中国国民情感的行为被学生拒绝,遂恼羞成怒殴打住校生雷述、张友棻等人。乐嘉藻知道后当即通告,后因交涉无效,解聘全部日本教师,关闭学堂,私费资助学生赴日本留学。乐嘉藻遂在贵阳住宅该设“学会”,自任会长和教师,让学堂未散去的20余名学生每日按时到会学习,但贵阳师范学堂已名存实亡,学堂寿命虽短暂,但是作为贵州第一所师范学堂,为贵州师范教育提供了宝贵经验并且发挥了示范作用。

辛亥革命后,1911年以自治学社为首的贵州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清朝在贵州的统治,同年11月贵州成立大汉贵州军政府。贵州政局动荡,学校建设也受到了牵连,清末的学堂大多改换门庭,有的甚至停办。贵州师范教育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其中有贵州优级师范选科,有贵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创办于1908年3月,校址在贵阳市雪涯街,教员方面,算术教员孙敬之为日本留学生,物理、图画教员黄干夫为日本留学生,化学、教育学教员王仲肃为日本留学生,经济教员金仕春曾经留学日本法政,留日学生学成归国后,大多为教育事业做着不同贡献,辛亥革命爆发后,1912年省政府将该学堂改名为贵州省立师范学校,任尹笃生为校长,尹笃生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05年以官费生资格留学日本,1912年回到贵阳,归黔后一直为贵州教育事业忙碌,培养大批优秀师生,1920年去世,为贵州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尹笃生归来之际,适逢乱世,正值政治波动时期,当时贵州省立师范学校只有初级,亦称贵州初级师范学校,尹笃生主持校务,在改革学校学制、完善学校设施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

一是自力更生,依靠黔人自主办学,完善教学设备、收集教学资源,并聘请学有专长、经验丰富的教师,为学校提供人才资源保证,1913年,西南军阀混战,滇军侵黔后,学校教室仅剩一间,尹先生四处呼吁,申请拨款,添加修建学校校舍,亲自监工,节约开支,花费一年多时间将新校舍修建完毕,并购买了大量书本和教学设备,改善学校后勤,给学生发放生活用品。学校毕业生遍布贵州。每年都有学生进入学校学习。

二是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使教学活动规范化,形成严谨、重教、朴实、勤学的优良学风。自己亲自制定教学计划,组织教师钻研教材制度、学生管理制度,学生犯错误,不是采用直接体罚,而是陈述利弊,诱导启发学生。让学生心悅诚服并且关爱学生,在和教师们的共同努力下,“贵师”成为贵州重要的师资基地。学校形成了优良的学术传统。

三是严格录取学生,择优录取,不徇私情。贵师为省立学校,每年都有大批学生报名该校,录取率不到百分之十。为杜绝说情,学校组织阅卷委员会,评分后尹笃生亲自审核,依次录取,避免教师徇私情,尹笃生也说:“师范学生毕业后要为人师表,应为千秋万代的后人负责”。

尹笃生品德高尚,专心办学,高风亮节,不汲汲于富贵,毕生致力于贵州教育事业,正如他的学生所说,尹校长从接办到逝世“无一日不在学校,无一事不自理,不但不干预政治,连家事都不甚注意。”这种大公无私的办学精神令人感动,贵州师范教育的发展和尹笃生的努力息息相关。

3.2 法政学堂

清末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京师法律学堂的创办、立宪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贵州地方行政官员做出了响应,创办了“贵州官立法政学堂”。创办宗旨是:“教授官绅,以改行宪政应用必要学科为宗旨,以普及法律思想,度储佐理人才为成效。”法政学堂的创办是为了满足社会需求,培养法律人才。

清末法政学堂的兴起几乎和留日高潮在同一时期,1905年林绍年派出的留日学生中很多专业是法政科,他们陆续回国后,就有不少人任职于贵州法政学堂,其中就有1905年自费赴日考察的蔡岳、同年官费赴日学习法政的吴绪华张鸿藻等人。法政学堂开设的学科有政治学、国法学、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等,法政学堂开设的这些学科对当时相对保守的贵州而言,成为地区知识分子转型的重要知识元件。留日学生成为教员也为学堂的注入了新鲜血液,带来了新的管理方式和学习方法。

法律教育的转型也是教育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10年学部通令各省,按序扩充法政学堂,于是出现了私立法政学堂,这一时期张百麟创办了公立西南法政学堂。任可澄、华之鸿等创办了公立法政学堂。留日学生在法政学堂任教,传播着新的法理观念。张鸿藻在《自治学社杂志》发表《自治之原理》、《国家与国民》等三篇文章,针砭时弊,观点鲜明指出中国数千年的封建专制在国家和国民观念上造成的弊病,启发了学堂学员,他的“国家主体说”、“国民责任说”等政治主张,推动了西方法理观念在贵州的传播,清末民初贵州法律虽然有所起步,但政局动荡,法政学堂也是几经波折,培养出来的真正有法学功底的学员不多。民国十六年北洋政府公布《律师章程》换发律师证,审查律师资格,贵州省审查合格只有10人。说明清末民初的法律教育依旧不太完善,但是作为开端,为后来法律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学术基础。

4 结语

中国留日学生在清末民初时期数量庞大。贵州近代化的推动离不开贵州思想先进、勇于学习新知识的具有新思想人物的推动,贵州近代这些先进的人物大多留学日本,这些人的到来加速了贵州向近代文明的转型,提升了贵州的文明程度,留日学生促进了贵州学科教育的多元化,传播了西方的教育思想、法律思想,为日后贵州文教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和观念基础,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加大对贵州的扶持力度,引导贵州科教文卫的发展,继续深入实施“文化立省”“教育立省”的基础策略,继续推进文化产业教育事业的发展,贵州的文明程度进一步加深,文明涉及遍布贵州的各个方面,回首贵州近代化的艰难起步,仍是一个缺乏文化资源的地区。要实现贵州文化进一步的发展繁荣还需持续的努力。

参考文献:

- [1]岳程楠.留日学生与清末四川教育近代化[J].日本问题研究,2009(4):5.
- [2]梁中美.晚清民国时期贵州留日学生与贵州近代化[M].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